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419

二程体用关系浅析:北宋儒学中实践与理论之辨

吴描晖¹ 叶晨曦²

(¹郑州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1, ²香港浸会大学, 中国 香港 999077)

摘要: 宋人在五代十国乱世之后, 社会变革促使人们深刻反思时局, 试图通过体用关系找到时代的出路。在这一时期, 儒释道的合流成为一种趋势, 北宋文人因此涉足于多元的思想传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二程的思想突显出其独特性。他们在时代的变革中, 通过对体用关系的建构, 试图理解时代的思想迭变的根本答案。文章旨在对二程体用认识上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理解北宋儒者有关体用有何所辨。

关键词: 体用关系; 二程; 张载; 朱子; 宋学

一、体用关系的哲学意义

“体用”这一概念的辨析是北宋儒学根本, 二程对体用的建构成为了北宋哲人必须面对的议题。宋代以前体用思想颇为复杂, 亦可反映前代哲学家使用体用之特色。在经历五代十国乱世之后, 人们试图通过体用关系找到时代的出路, 儒释道三家的合流的体用思想, 使得北宋文人涉及佛家道家儒家传统与中国固有之思想传统相结合, 由此出发, 回到二程思想对体用认识之别, 从而得到时代变换所带来的思想迭变关键答案。

(一) 体与用的定义与区分

在当今世界主流哲学体系中, “体”这一概念通常被理解为事物之本体、实体或存在形式, 它揭示了事物所固有的实质或本质。相对而言, “用”则更多地是指事物的效用、作用和功能, 它关注的是实存之物在实际运作中的各种表现。

进一步地, “体”强调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结构, 它深化了我们对事物内在本质的理解。而“用”则更加注重事物的外在功能和实际运作, 它涉及到事物的实际应用和运作方式。在哲学中, 这种体用关系常被用于区分抽象概念与实际经验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深入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之辨时, 可以发现各家学说虽然在大体上相似, 但在细节上的认识却存在一定的分歧。以程朱理学为例, 该学派强调“格物致知”的观念。这一观念最早出现在《礼记·大学》中, 其中提到: “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1] (《大学》第一章) 在这里, “格物”被朱子理解为实际观察和实践, 而“致知”则关联到对知识的理论追求。这一理解揭示了体用关系的哲学内涵, 并突出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互补关系。

除了程朱理学之外, 道家哲学也对体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理念, 这一理念强调通过无为的方式达到治理的目的。他写道: “是以圣人之道, 虚其心, 实其腹; 弱其志, 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 则无不治。”^[2] (《道德经》第三章) 通过这一理念, 我们可以理解到道家通过体察自然人伦、领悟道的原理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治理境界。

总体而言, 中国哲学中的体用关系不仅反映了实践与理论、本体与功能之间的深刻思考, 而且强调了

¹ [作者简介] 吴描晖 (2000-), 女, 汉族, 山西侯马人, 郑州大学哲学学硕士。

² [作者简介] 叶晨曦 (2001-), 男, 汉族, 浙江衢州人, 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硕士。

在追求智慧、道德和社会治理中如何平衡抽象原则与实际应用的重要性。这种平衡使得我们在探索世界和人类存在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功能，从而实现更加和谐和有意义的哲学思考与实践。

（二）体用关系在宋学中的地位

宋学与传统汉学训诂有所区别，其学术重心多置于义理之本。自二程以来，体用关系成为哲学体系核心之一。在理论探讨中，二程对体用关系之贡献颇多，凸显其在宋学中的重要地位。

首先，二程阐述体用关系为知先后之基石。程颐所言“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3]（《二程遗书·卷第三》），“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之？”^[4]（《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在其哲学体系中，理论（体）与实践（用）被视为相辅相成，虽不可分割，却有先后之序，引导之功。通过深入领悟天理，即宇宙秩序之法，个体得以理解道德规范，确立正确之理论认知。朱子亦对此予以批判性继承与发展，于《朱子语类》卷九中记载：“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5]（《朱子语类》卷九）不仅讨论本体与发用之先后关系，且丰富了知行学说之哲学内涵，强调行上本体为实践之根源，在日常人伦中更应有所践行。此类理论认知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实践中得以验证与实现，使所行之先成为哲学核心原则。

其次，二程在体用关系中强调“体”之重要性。体，即理论性认识，被视为对天理之深刻领悟。通过对天理的体认，个体能从内在出发，不假外物，对“体”作出准确把握。由此，体用关系中之“体”不仅是抽象概念，更是对宇宙秩序之深刻理解，为实践奠定坚实哲学基础。

在宋学中，尤其是程颐理学，体用关系表现为经典深刻理解与实际应用之结合。通过学习经典，个体不仅能够领悟道之真谛，同时在实际应用中，借助器物，道可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此将经典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之思想，强调体用关系在日常实践中之具体体现。

总之，体用关系为二程哲学中宋学体系之支柱。通过对天理之深刻理解，对体之准确把握，以及对经典与实际应用之有机结合，体用关系为宋学哲学奠定深厚理论基础，成为宋代儒学发展之特色。

二、二程对体用关系的阐释

（一）典籍文本分析二程关于体用的基本观点

天理一词最早来源于《庄子》“依乎天理”，而二程却是最早明确使用天理一词作为其哲学根本，程颐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6]（《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这一论断展现了他对天理问题的独立思考和深刻理解。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天”往往被理解为自然秩序的法，是宇宙运行的根本法则。二程以“理”释“天”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中，“天者理也”的论述说明了，明道进一步抽象化“理”为某种存在的宇宙秩序，将“天理”奠基为后继者的哲学基石。这种理念意味着在理学家看来，天理即是维系宇宙秩序的道德法则，是理论与实践、知觉与行为之间的纽带。

二程对“体”的关注则源自对天理的深刻体认。在他的哲学中，体用关系被构建在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上。体，即理论性认识，被看作是对天理的深入领悟。在这个理念中，理论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实践得以验证和实现。二程将人之心作为最现实的本体，强调通过对天理的体认来把握“体”的确切性。这使得个体能够从内在出发，不假借外物，对“体”进行最为准确的把握。

在宋明理学中，关于发用与事功的讨论往往强调对经典的理解与运用。明道的“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4]（《河南程氏遗书》卷六）这显然与汉学家视经典为至尊，经与注不可动摇的观念有了很大差异，经典已被置于器、用的地位，服从于本体之道了体现了对经典和器物的重视。他认识到经典是承载道之体，而器物则是适用之具。通过学习经典，个体可以领悟到道的真谛；而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器物的运用，道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这种将经典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思想，凸显了二程对“用”的关注。此外，程颐在《易传序》中阐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7]此言道出事物中，在隐微之理与显著之象之间，体用二者本于一源。

总体而言，二程通过对天理的深刻理解、对“体”与“用”关系的探讨，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在

这一体系中，个体通过对天理的深刻体认，从而准确把握“体”的实质；同时，通过对经典的理解与事物的运用，实现对“用”的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这种独特的体用关系构建，为宋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

（二）二程体用关系的内在逻辑结构

二程的体用关系是对天理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构建的，后继的哲学体系也多以宇宙秩序的法则为核心。在这个体系中，体用关系得以确立，强调体，即对理论性认识，是对天理的深刻体认。这种对天理的认知成为他们思想的基石，也是理论认知的起点。此外，体用关系还体现了知行哲学的原则。在二程的理学中，理论（体）和实践（用）被视为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通过对天理的深入体认，理论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更是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和实现。这种知行互发的思想贯穿于体用关系的内在逻辑之中。

二程对“体”的关注是他们体用关系内在逻辑的关键。体，即对天理的深刻理解，使得个体从内出发，不倚赖外物，对“体”进行最为确切的把握。这强调了体用关系中“体”作为理论基础的不可或缺性，为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此外，二程在体用关系中将经典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强调了实际行为的伦理基础。通过学习经典，个体能够领悟到道的真谛；而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器物的运用，道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这种将理论与实际行为有机结合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二程哲学体系的丰富性和实践性。

总体而言，二程的体用关系及其内在逻辑在宋学乃至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对天理的深刻认识、知行互发的哲学原则、对“体”的关注以及将经典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策略，冲破了传统经学的桎梏，使得他们的哲学体系具有丰富的内在逻辑。这一体系对中国哲学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不仅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同时也为个体在现实生活中践行道德提供了指导。

三、二程体用观对其他哲学家体用观生发的影响

（一）二程体用论证与对张子的批判

张子与二程关系较为密切，这种密切不仅局限与他们的叔侄关系，更多体现在他们一生的学术追求中。当我们将二程和张子一共讨论时，就不可避免要谈及到关洛学派。关洛学派指的是张载在关中创立的道学学派，洛学则是指程颢、程颐在洛阳创立的道学学派，两者虽共为道学，但细节方面仍然是大同小异。早期二程弟子普遍认为关学出于洛学，一说是自张子京师论易之后有所启发，是否如此也就难以考究了，但对各自为学的根本出路也有了不同的见解。

二程与张子的体用的讨论，主要体现在程颐《答横渠先生书》中讨论太虚即气，张子曰“知太虚即气，则无无”。^[8]太虚根据张子的释义指广大空间，具有明显的宇宙论倾向；气则为万物生生之气。张载认为太虚就是气，虚与气为同一物体的两种不同形态，乃是一物两体。张子太虚的提出虽是对抗佛老的虚无观，实质上是解决了自邵雍周敦颐以来的本体论物体，例如邵雍的“数”，周敦颐提出的“无极而太极”^[9]，这类论述从本质上看任然是空虚无存的，还是承继了传统道家无中生有的观念，以无释易，这会导致体用不相贯通的理论困境。因此“太虚即气”这种本为一体的理论根基解决了体用相绝的根本问题，继承了儒学传统天地自然与人身心性命的密切联系的天人理论。

二程认为，尽管张载的太虚及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某些理论困境，但理论本身仍存在一定缺陷。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张载对“太虚”本体的表述不够精确，“气”的化用表述模糊，对体用关系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在二程集中有具体的批评

“子曰：子厚以清虚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7]117}（《二程集》第117页）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7]118}（《二程集》第118页）

“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7]66}（《二程集》第66页）

“或谓许大太虚。先生谓‘此语便不是，这里论甚大与小’”^{[7]66}（《二程集》第66页）

二程的观点显现出他们认为“太虚”一词并不能充分承载天道的内涵。如果将其视为本源之体，那么这一表述过于浅显，无法与生成发用建立明确的联系，也无法很好地阐述体用之间的内在关联。关于本源

与化生的问题，他们的表述并未明确。尽管他们对张子道学的根源表示认可，但由于理论不足，导致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失衡，呈现出头轻足重的状况。不可否认的是，二程通过深入剖析张子的思想根源，揭示了他以天理为道学体系基石的观点。

（二）朱子对二程体用观的继承

朱熹的学说启承与洛学，在继承二程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丰富，为二程学说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正如张子二程的关学洛学有着独特的地域痕迹一样，后世学者将朱子学说称之为“闽学”。

朱子谈体用与二程和张子不同点在于朱子并不满足于仅仅从自然运化的角度去理解体用，也没有将理气关系直接同等与体用关系，而是尝试从更深层次去揭示它们的本质。他明确指出，理气之间的先后关系仅仅是逻辑上的，而非时间上的，理与气是组成一物一事的本质所在。而在朱熹看来，“未有此气，已有此理”^[5]（《朱子语类》）这句话是对体用关系的最好诠释。这不仅意味着在事物产生之前，其本质或规律已经存在，而且揭示了体用之间的逻辑先后关系。换句话说，在事物的产生过程中，本质或规律先于实体或现象存在。这种观点与二程和张子的看法有明显不同。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体用是相互依存的，实体或现象是本质或规律的表现。然而，朱熹却强调了体用的逻辑先后关系，认为本质或规律在逻辑上先于实体或现象存在。

此外朱子还提出了“理一分殊”的概念，意在解释人伦中的心性之别，也阐释宇宙间的普遍法则和万物的具体表现形式。语意本质上，它表达的是一种宇宙观，即万物虽各有其独特性，但都根源于同一个普遍的、根本的“理”，亦即“太极”或“天理”，而“分”是万物所特有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有所“分”，这个“分”使得万物相互区别，各具特色。无论是自然生化，还是人伦日用，都各有所“分”。“一”则是“理”和“分”的结合点。朱子认为，虽然万物各有其独特的“分”，但它们都根源于同一个普遍的“理”。这个“理”作为一个统一的纽带，将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观念下，万物虽然各有差异，但内在的本质却是相通的。

朱子对体用的论述其中包括“性情体用”这一重要概念，也是朱子思考一生的重要命题。朱子从性与情的已发与未发之说，到后来意识到二者内在相互关联性，他对此作出了详细的阐述：“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5]。这一观点揭示了人性的本质与情感的外在表现。朱子认为心之体为性。这里的“性”指的是人的本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质。人性是善良的，具备道德意识，使人能够明辨是非、择善而从。人性是一种内在的、不变的本质，它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和价值取向和日用实践。

四、结语

二程对体用关系的辨析是以经典文献的深刻阐释为基础，致力于探讨如何将儒家伦理融入日常生活。他们的后继学者强调理论应当贴近实际，道德不仅仅停留在本体层面，言辞之间，更要在日常实践中得以体现。这种注重实际的理论观念，为儒学注入了更为具体的生命力，使之更能应对北宋社会剧变所带来的现实挑战。我们不禁要反思二程体用之辨对前代儒学体用关系的继承和对后世儒学根本上的引导的深远影响，他们的思想不仅为儒家传统增添了新的本体意义，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经验。在这场形上之体与形下之用的纷繁交汇中，在乱世之后的宋学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批判吸收了儒释道三家理论，为中国传统体用的丰富多元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朱熹注.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2] （春秋）老子著；陈徽译注. 道德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01
- [3] （宋）程颢. 二程全书 册3 河南程氏遗书 第19-25、附录[M]
- [4] 朱熹编. 河南程氏遗书 一册[M]. 商务印书馆，1935. 04.
- [5] （宋）黎靖德编；杨绳其，周娴君校点. 朱子语类[M]. 长沙：岳麓书社，1997. 11.

- [6] (宋)程颢, (宋)程颐撰; 陈京伟笺证. 河南程氏遗书 河南程氏外书[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20. 10
- [7] (宋)程颢, (宋)程颐著; 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8] (宋)张载著; 章锡琛点校.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08.
- [9] 冯国超主编. 太极图说[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07.
- [10] 田丰. 朱子体用论发微[J]. 朱子学刊, 2018, (01): 66-90.
- [11] 张品端. 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J]. 中国哲学史, 2023 (05): 100-106.
- [12] 杨立华. 用礼成俗与义理养心: 论张、程殊途的思理根源[J]. 船山学刊, 2023 (03): 60-67.

The Substance-Function Relationship in Cheng Brothers' Philosophy: Exploring the Practice-Theory Dialectic in Northern Song Confucianism

WU Miao-hui¹, YE Chen-xi²

¹Zhengzhou University ²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tumultuous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the social chang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prompted people to deeply reflect on the state of affairs and seek a way forward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became a prevailing trend. As a result, Northern Song scholars explored various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thought of the Cheng brothers stands out for its uniqueness. Amidst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y constru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to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 answers to the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era. This paper aims to deeply explore the Cheng broth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in order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distinctions made by Northern Song Confucian scholars regarding this concept.

Keywords: Ti-Yong (Substance-Function); Cheng brothers; Zhang Zai; Zhu Xi; Song Confucianism